

歐洲與義大利地區有關蔣介石 及其時代的研究

〔義大利〕圭德·薩馬拉尼 撰
徐亮 譯，陳紅民 校

前 言

2011 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的人際網絡》一書收錄了一篇令人關注的文章，題為《蔣介石相關主題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海外）》，作者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文章稱海外有關蔣介石頗具影響力的研究，絕大部分是由美國與日本學者所作。黃先生在文中將這些海外研究按照地域觀點分為兩大組：“歐美組”與“日本組”。事實上，在“歐美組”當中，可以看到歐洲地區有關蔣介石及其時代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大體上說，歐洲部分的研究包括了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與英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史景遷出生於英國，但其學術生涯主要在美國——譯者注）非常重要的著作，然而，他們的著作主要是對中國近代史的綜合研究，並不特別針對蔣介石及民國時期。

在過去的十數年裡，此種情況沒有多大改變，迄今有關蔣介石的海外研究仍舊由美國和日本的史學界所主導。然而，歐洲史學亦取得了不少進步，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研究趨勢。

在此，將介紹歐洲和義大利學者有關蔣介石及其時代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基本上是民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在第一部分，我將從整體上來介紹歐洲學界的研究；在第二部分，將特別介紹義大利地區的研究（包括我本人的研究）及未來展望。

蔣介石研究在歐洲：總體概述

第一個（或者第一批）寫作有關蔣介石重要傳記的歐洲學者，應該是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作為一名探險家與地理學家，他領導前往中亞的各種探險，在塔里木盆地的荒漠裡，繪製了城市、墓地及長城等遺址的地圖。正是在那段時間，赫定訪問中國，並在南京見到蔣介石。他所撰寫的題為《蔣介石：中國的統帥》（*Chiang Kai-shek: Marshal of China*）的人物傳記，最初為瑞典語，1940 年譯為英文本出版。赫定分析了蔣介石從東渡日本到領導中國這一時期的個人經歷和政治生涯。他寫道：

在 1933 年夏，我與南京中央政府進入到一種非常親密與信任的關係。我被要求並接受了勘測任務，並在中國專家們的協助下，為國民政府測繪兩條汽車公路線路——這些規劃中的公路將用來連接中國內地與新疆省。早在 1929 年春，我曾在南京榮幸地會見了

大統帥蔣介石將軍，而當我在1935年2月完成汽車旅行回來後，我有幸去漢口，向他和他嫵媚的妻子呈報這次探險所得的報告。在這兩次場合中，統帥卓越的品格給我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

從這些字句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作者無疑是蔣介石夫婦的“超級粉絲”。而且，此書亦是獻給宋美齡的，他在首頁寫道：“獻給蔣介石夫人，以示欽佩”。

總體上說，赫定的作品出版之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蔣介石在台灣開啟新的政治歷程之後，歐洲關於蔣介石及其時代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尾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國際史學主流，傾向於對蔣介石及其歷史地位持相當批評的觀點，尤其強調蔣在一些關鍵時期，錯誤地決定集中軍事力量對付共產黨，而非日本侵略者，同時蔣亦被“指責”在1949年“丟失了中國”。

然而，即使在對蔣持批判的主流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強調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南京政府早期所遭受的日本入侵，實實在在地削弱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決策空間。

例如，德國歷史學家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Jurgen Osterhammel）在他的傑作《中國與世界》（*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1989年出版）中，強調西方帝國主義在經歷1927～1928年的反共“清洗”後，以及面對日本人變本加厲地施行征服中國計劃的情況下，是如何重建與蔣介石的聯繫與合作的。

同樣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由法國學者畢仰高、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以及德國學者杜勉（Jürgen Domes）共同編著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接連不斷的革命（1895-1949）》（*La Chine au XX^e siècle.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1895-1949*）一書中，德國學者賀伯森（Herman Halbeisen）寫了對南京十年（1927～1937）的綜合評價：“一個巨大的分歧割裂開來：一方面是民眾的期望與政府的意圖，另一方面則是南京十年究竟有哪些是真正有效的？”

史景遷在1990年出版的非凡作品《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中，專門有一章探討二戰結束後國共兩黨所進行的內戰，題為“國民黨國家的陷落”。史景遷強調了下述事情的重要性：蔣介石試圖將中國的通貨膨脹恢復到一個可控範圍的努力，完全落空；國民黨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消極選擇——“印刷更多的鈔票，這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史景遷同時也強調，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裡，存在著日益增長的黨派之爭以及社會對政府的不滿；蔣介石大權獨攬有著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在重慶時期。

過去的二十年左右，隨著新史料的大量出現，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研究新趨勢，歐洲對蔣介石及其時代的消極分析開始逐漸消失，朝著更加深入和客觀的方向轉變。

韋立德（Tim Wright）教授主持的龐大項目《牛津中國研究書目》（*Oxford Bibliography in Chinese Studies*），是一個多重交叉學科的在線書目文獻（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旨在為貫穿整個領域的關鍵工作提供一個權威指南，向各個層面的研究者和從業人員展示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既有歐洲各國語言，也有漢語及日語。其中的“蔣介石”部分，是由一位來自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學者戴杰銘（Jeremy A. Taylor）完成的。他代表了一種與之前研究不同的途徑。

戴杰銘在“序言”中寫道，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有爭議的人物之一，是一系列史學作品、人物傳記、言行錄以及妖魔化作品的焦點。在早期的批評中，蔣介石從1927年清洗共產黨起，便被視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這個評價現在是歷史學家們的爭論點。蔣在南京十年（1927～1937）所建立的統一而獨裁的國家，同樣也是學術界突出的重點。蔣在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

1945) 中的角色，是中國之領袖。早期的學者總是將他們的研究定格於 1949 年，即蔣介石在內戰中敗給共產黨，隨後退往台灣。然而，最近的學術成果開始探討蔣介石在台灣度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爭議和成就，以及 1975 年後他留給這座島嶼的遺產。儘管蔣介石研究在政治上、方法論和國家路線等層面仍存在重大差異，但“蔣介石日記”於 2004 年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公開（蔣介石日記是 2006 年才正式對外開放——譯者注），為之後興起蔣介石再評價的學術潮流提供了保證。

戴杰銘博士同時作為首席調查員，參與一個專為蔣介石創建而相當有趣的影像數據庫。這個項目的標題相當具有刺激性：《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視覺敘述》（*Enemy of the People – Visual Depictions of Chiang Kai-Shek*, <http://www.hrionline.ac.uk/chiangkaishek>）。

根據設計，這個數據庫將收錄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領導人蔣介石被各方在不同層面詆毀的資料，包含了不同團體對蔣介石各式各樣的描述，例如日本“皇軍”、新中國的連環畫、蘇聯的宣傳者、美國漫畫家和“台獨”分子。時間上從 1940 年代延續到 2000 年代。尤其集中關注蔣介石負面的圖像（從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日本軍隊的“反蔣”小冊子，一直到 1970 年代出現在美國媒體上諷刺蔣介石的圖畫），海報、傳單、油畫，乃至肖像照和損毀的雕像，都將包含在內。網站上的圖片可以根據關鍵詞、圖片標題、藝術家姓名和主題來進行搜索。對於每一件收納的圖片，該網站還包括一篇介紹性的文章和各種細節。新的圖像將繼續定期添加收集。

蔣介石研究另一個重要貢獻是由范力行（Jonathan Fenby）所著的《委員長：蔣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國》（*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事實上，范力行不是一名真正的歷史學家，他擅長政策解讀、政治學和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專家，他曾是路透社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首席通訊記者，也是《獨立》（*The Independent*）等報的助理編輯。其個人傳記表明，范力行從牛津大學獲得了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學位，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擔任助理研究員，他是十六本書的作者，其中八本是關於中國的。

這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歡迎的蔣介石傳記，范力行基本上是從 1936 年蔣在西安開始寫起。當時蔣介石剛度過 50 歲生日，正準備痛擊共產黨。讀完他的作品以及與其相關的各種評論，我們可以說，范力行很好地利用了過去二十年間所出現的各類二手材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范力行引用了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陳潔如所作的《陳潔如回憶錄》一書，陳被丈夫“勸說”離開而前往美國加州，這樣蔣才能夠與強大的宋氏家族聯姻，或者具體地說，是與宋氏三姐妹的三妹宋美齡結婚。

范力行告訴我們，蔣介石是十分嚴厲的，就像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在 1920 年代崛起的廣州黃埔軍校中，他之於學員，就是嚴厲紀律和命令的堅持者。在他寫給兒子經國的書信中，總是沒完沒了地責備這個小男孩書寫筆跡上的缺陷。

事實上，根據范力行的說法，蔣介石為數不多深情流露的時刻，正是 1936 年他被張學良將軍在西安附近“囚禁”的那段時間。

正如我們所知，范力行的傳記遺憾地疏漏了蔣介石一生最後的二十六年，即在台灣的“總統”任期。與此同時，范力行的解釋對挽救蔣介石作為個體的名聲，也作用甚微。他強調蔣介石是一名過於敏感、渴求權慾的獨裁者，他對待任何在他身邊的人都驚人地無情。范力行強調，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他稱之為“宋氏關係”）對蔣氏的政治生涯，尤其對於尋求財政援助以及增強國民黨在美國的影響力，都是十分重要的。

要特別提及的是芮納·米德（Rana Mitter）最近的成果。他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是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在民國史與國民黨史幾個領域裡最具權威的學者之一。在其 2013 年出版的新著《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該書英文名原為 *China's War with Japan*，後以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在美國出版——譯者注）當中，米德顯然把目光聚焦於 1937～1945 年的戰爭，而全文的中心人物很明顯就是蔣介石。

《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並不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史學（儘管對於不熟悉該領域的人而言，乍一看會有這樣的觀感），而是非常巧妙又融匯貫通的課題，把最好的外交、政治與軍事歷史放到一個高度可讀的格式之中。米德同樣也重讀了“蔣介石日記”，在其他人的作品中，“蔣介石日記”已經成為關注的主題之一。米德卻能夠將日記融入到宏大敘事之中，並向我們展示這些日記如何改變大家對戰爭的觀點。

這本書特別出彩之處，便是書寫中國戰時心臟——重慶的情況，以及重新聚焦於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時間段。米德正確地提醒我們重慶的重要性：它雖被日本人猛烈轟炸，但仍成為國際合作的連接點，削弱並最終摧毀了日本帝國。在這裡，米德很明智地把戰爭過程分為兩個關鍵階段：1938～1941 年的“孤軍奮戰”階段與（珍珠港事件以後）1941～1945 年的“飲鳩為盟”階段。

“飲鳩為盟”一章中所描寫的中美兩國的史事，我們多已知曉。但米德以此為契機，把原本視國民黨腐敗為 1941 年後政權失敗主因的單一視角複雜化。他把一個在中國的美國人——約瑟夫·史迪威描寫成帶著他國資產卻相當無知的賭徒，同時史迪威又以蔣介石為代價，向媒體提供支持他自己地位的信息。米德強調，中國失敗的經濟與長期忍受的人民創造了下述情形：迫切需要政府強烈回應（以生存的名義）；同時，諷刺地是，亦使國民黨毀滅。

米德直言不諱地給他的敘述下了結論：如果沒有抗戰，中國早在 1938 年就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不是成為盟軍對日作戰中極為關鍵的一部分。此外，他還表示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動盪不已、動亂不安的地方，有著強大的地方政府、方言繁多、民族紛雜以及地域文化之差。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抗戰講得合乎情理？米德以他的著作告訴我們，必須從蔣介石領導的南京 / 重慶政府開始（敘述），但隨後的注意力便放在那些可能改變故事結局的地方。

還有兩個非常有創新精神的研究項目需要提及：

第一個，“視覺化的中國，1850-1950”（*Visualizing China 1850-1950*），以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為基地，由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運作。這是一個基於網絡的資源庫，允許用戶搜索超過 8,000 份數字化的圖像，均是拍攝於 1850 年至 1950 年有關中國的歷史照片，面向研究者、學生以及任何對該時期中國圖像記錄感興趣的人。它提供與之相關的收藏品的交叉搜索，有助於避免在搜索多個網站上耗時過多。如它把中國的歷史照片、羅伯特·哈特爵士的收藏品以及李約瑟在戰時中國的照片整合在一起，它還包括由專家們從谷歌圖書中選擇的資源。

如果在這個網上資源上檢索“蔣介石”（Jiang Jieshi / Chiang Kai-shek），可以發現大量有關他本人及親屬的照片。

第二個，是由安可強（Christian Henriot）教授運作的項目，他曾是法國里昂大學的教授，現為普羅旺斯艾克斯-馬賽大學教授。這個項目被命名為“虛擬上海”（*Virtual Shanghai*），是 2000 年作為一個聚焦上海歷史圖像的項目而啟動。然而，在工作的過程中，各種嶄新的工具被認識到，尤其是 GIS（地理信息系統），能為更系統化研究上海歷史的途徑提供極大的潛能。安可強教授和他的同事決定把歷史的 GIS 應用於上海，通過結合使用文本（文章、原始文檔）、視覺

(照片、電影、圖片、圖畫等)、聲音(聲軌、音樂等)和製圖文件,開展一種寫作城市歷史的新嘗試。在目前階段,這個項目提供了大量文章和文本記錄、圖像和地圖。因為它仍處於細化過程中,項目有的部分僅供那些參與的學者們登錄使用。然而,所有資源的絕大部分都是對公眾開放的。

最後,我簡略地提一下東歐地區有關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作品是《中國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由波蘭科學院非歐國家研究中心在2006年出版。編者施樂文(Maria Roman Slawinski)教授,他的著作以中國農民運動和孫中山研究為主。《中國近代史》收集了一系列其他波蘭學者的論文,其中特雷莎·哈利克(Teresa Halik)教授的文章特別探討了蔣介石的政治角色,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義大利對蔣介石及其時代的研究:已有成果與未來展望

在義大利,有關蔣介石主題的研究開展得相對較晚,但在過去二十年裡也有不少重要的進展為人所知,儘管這些進展遜於美國、日本和歐洲其他地區。

據我所知,惟一用義大利語寫蔣介石傳記的是布魯諾·左拉托(Bruno Zoratto)先生,他是一位傾向於右翼政黨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散文家,著作豐碩,其中一部分涉及到中國的不同方面(如孫中山、台灣、宋美齡、西藏等)。他兩本有關蔣介石的作品出版於1986年與1987年,前者名為《蔣介石:現代中國的設計師》(*Chiang Kai-scek, l'architetto della Cina moderna*),後者則為《蔣介石與歐洲》(*Chiang Kai-shek e l'Europa*)。在這些作品中,左拉托稱讚了蔣介石在現代中國建設以及對抗共產主義中的歷史與政治作為。

來自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樊米凱(Michele Fatica)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多年前,他發表了論文《墨索里尼時期的義大利與蔣介石田園詩般關係的開端與終止》(*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Idyllic Relations between Mussolini's Italy and Jiang Jieshi's China [1930-1937]*),收錄於《義大利與現代中國相遇:帝國夢想、戰略野心》(*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rn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2013*)。

樊米凱教授著重突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半期,一種“墨索里尼式神話”如何從義大利出口到“自由世界”,以應對蘇聯的“專制主義”。他強調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萊亞佐·齊亞諾(Galeazzo Ciano,他娶了艾達)來到中國,標誌著國民黨中國與法西斯義大利關係的轉捩點。不幸的是,齊亞諾的日記開始記載於1937年,未能涵蓋他在中國的全部歲月。

除了組織上諸如藍衣社確實是仿照了義大利的黑衫黨,法西斯主義是否有效地影響中國,這在義大利(亦不只是義大利)存有爭議。

在《義大利與現代中國相遇:帝國夢想、戰略野心》裡,必須重視除了樊米凱之外的一些其他文章。尤其是圭德·薩馬拉尼和蘿拉·德喬治(Laura De Giorgi)的論文。圭德的文章關注民國時期在中國的義大利人,其研究基於中國通商口岸(尤其是天津,但也包括上海)一個小而活躍的義大利人社區的形成與發展。這個社區大部分都是軍人和天主教神父與修女。蘿拉的文章則是關注二十世紀上半葉義大利報人、記者、作家筆下的上海故事。

一位在英國工作的義大利學者毛里齊奧·瑪瑞莉(Maurizio Marinelli)在2010年曾特意編輯了那些已刊的有關中意關係的文章。其中包括安傑莉(De Angeli)、蘿拉與圭德的著作,以及瑪瑞莉本人有關義大利在天津治外法權的文章。

在威尼斯大學，以圭德為首的一個小型研究團隊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近年來致力於加強義大利關於蔣介石與國民黨中國的研究。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 2011 年出版的《由遠而近：二十世紀的中義關係》（*Lontane, vicine. Le relazioni tra Cina e Italia nel Novecento*）一書中，兩位作者圭德與蘿拉探討了諸多主題。例如蔣介石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經驗的興趣，當義大利傾向日本後中義雙邊關係的破裂，四十年代後半期義大利駐華領事向其外交部報告有關中國內戰的發展形勢，以及對蔣介石與國民黨中國優缺點的評估等。

蘿拉與圭德也是《蔣介石及其時代：新歷史觀與展望》（*Chiang Kai-shek and His Time: New Histor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s*）一書的編者，該書於 2016 年出版，是 2013 年威尼斯大學舉辦國際工作坊的碩果。陳紅民教授和其他知名學者對此都做出了貢獻。威尼斯大學的學者是前文所述《牛津中國研究書目》的合作者，準備有關“國民黨”的文章（2016 年即將上線）。

最後，談談我個人研究的未來展望。

我正在做（以及將要做）的研究，是最近開放可用的由義大利駐北京公使館、駐天津領事館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發給義大利外交部的外交文件。這些文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已遺失或被日本人損壞，可卻在最近被發現，雖然只涉及中國北方。義大利對外交文件查詢的限制，最近從 50 年縮短到 30 年。對於這些文件的初步總結與評價，不僅為義大利在中國的活動，更是為蔣介石與國民黨中國的政策提供了有趣的分析。相關文章兩年前已在《歷史與外交》（*Storia e diplomazia*）上刊載，作為我個人與（義大利）外交部歷史檔案館管理館的合作成果。

此外，可能從 2017 年開始，我將負責新一批義大利有關中國與東亞外交文件的編輯。這些文件涵蓋 1947 ~ 1986 年這段時期，對此我們希望這些材料能有助於更好、更深入地瞭解下列問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與角色；中義關係；以及透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與五六十年代冷戰背景、美國對義大利政策強勢影響的歷史時期中，探究促使義大利從 1949 年至 1970 年支持蔣介石的政治理由。

作者簡介：圭德·薩馬拉尼（Guido Samarani），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亞洲與北非研究學系（Dipartimento di Studi sull'Asia e sull'Africa Mediterranea, 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教授。

譯者及審校者簡介：徐亮，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陳紅民，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杭州 310028

[責任編輯 陳志雄]